

《历史与理论》 论文提要^{*}

2011 年 10 月号

1. 布兰科·米特洛维奇：《概念的归属与时代错置问题》

在思想史家以特定概念（concept）指称某个历史对象时，往往引发时代错置（anachronism）的问题。学术界对此问题长期存在争论，实际上，这种争论的产生源于对“概念”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t）理解，而本质论的“概念”本身缺乏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支撑。本文提出以原意论（intentionalism，即文本的意义取决于原作者阐明或暗示的“原意”，译注）替代本质主义，从而澄清并避免时代错置的典型流弊。

2. 杰弗里·安德鲁·巴拉什：《历史神话与作为神话的历史哲学——汉斯·布鲁门伯格对厄恩斯特·卡西尔神话理论之阐释的矛盾态度》

本文探讨了厄恩斯特·卡西尔和汉斯·布鲁门伯格关于柏拉图哲学与神话关系的不同理解，以此揭示他们对于何为“神话”的根本性歧异。本文试图表明，他们对“神话”的界定是与他们对于“神话的历史意义”以及更一般的“历史观”的假定密切相关。他们对于“神话”和“历史”的不同理解，不简单地是抽象思辨的问题，两人的分歧更多地源自他们对于“神话的政治意义”的理论预设。本文的考证分析并不止于调和两种神话定义间的紧张关系，也非展示布氏对卡氏理论的批判性吸收；本文的首要目的是希望有裨于理解神话的政治涵义及其在当代的历史效力。

3. 陈壮飞：《边缘人与怪胎：微观案例研究如何推致宏观命题》

微观案例研究如何引导我们提出惊人的宏观命题？历史学家常说，微观案例的光芒能投射至宏观层面的研究。这种“投光”（casting light）的隐喻说明，微观案例并不直接阐明宏观问题——其光芒必须经由学者做进一步的阐释。在本文中，笔者提出并明确阐述六项解释性规范，来引导微观至宏观的推论。

笔者主要着眼于边缘人和“怪胎”（monsters）——尽管这些广受社会史和文化史专家青睐的案例乍看似乎缺乏进行普遍性抽象的可行性。边缘人群往往被主流群体视为低级的或邪恶的，他们的生活是如此易于理解以致可以忽略不计。另一方面，罪大恶极的暴徒则在一定程度上被

^{*} 《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国际知名史学期刊，每年2月、5月、10月、12月出版，由美国维思里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主办。

社会视为匪夷所思的怪胎。笔者首先表明,通过研究某一社会如何标识边缘人群并与之互动,我们可得出关于该社会的自我形象和社会状况的有趣推论。通过解读“怪胎”的人生,我们可推出其所处社会的心态及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这些将挑战我们既有的“宏观命题”概念。其次,笔者指出此类推理蕴含的四大风险,并明确阐述如何通过诸如一致性、挑战、约束、勾连、激发、情境等规范来应对这些风险。

笔者的策略是分析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发表于1972的个案研究成果。他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暴匪和半文盲的地方恐怖分子的个案研究,展示了科布富有创见且不拘一格的史家特性。他在开创微观史研究的崭新途径的同时,又因引入了自传性因素而使这些理路扑朔迷离。这些理路说明了史家能够将对自传、文学及史学史的兴趣融入一种不乏风险但常常富有启发性的风格。

4. 阿德里安·布劳:《不确定性观念史》

思想史家经常提出经验性论断,但却从不确定这些论断是否正确。因此,不确定性成为思想史家不可避免的问题。但仅仅承认不确定性是不够的:我们还应采取行动,尽量减小不确定性,并汇报给读者。我们可以通过收集大量来源不同的有效数据,来权衡各种竞争性命题的优势和缺陷,从而减少不确定性,而不是通过只寻找有利的证据来证明一个经验性论断。然后,我们需要汇报所下论断的确定性程度。当我们回答思想史上的实证问题时,我们不是要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相反,我们要告诉读者的是,我们所利用的证据在多大程度上能支撑我们的论断,这是分析转移的关键一步。进而,正如凯恩斯(Keynes)和科林伍德(Collingwood)所言,对思想史家来说,不确定性是一种主观感受。因此,本文探讨了主观不确定性与客观不确定性之间的三大差异。在概述不确定性的理论基础后,笔者以诺埃尔·马尔科姆(Noel Malcolm)的作品为例,说明如何在实际研究中减少并汇报不确定性;随后借大卫·伍顿(David Wootton)的作品说明如何处理关于信仰(beliefs)的不确定性。

5. 瑞安·安东尼·维埃拉:《衔接新政治史与近期的时间加速理论:速度、政治和“世纪末”英国的文化想象》

“社会加速”(social acceleration,即近年理论界从社会、文化角度探讨“速度”这一概念的学派,译注)的政治影响是近期在社会和政治理论界风生水起的热点话题,但在史学界,此概念还未掀起任何涟漪。尽管众多英国史学家已经注意到了晚期维多利亚和爱德华七世时期文化想象元素所体现的引人瞩目的加速现象,但这些观察尚未扩展到修辞研究领域之外。本文试图构建一个双向的跨学科桥梁,来衔接英国政治史和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加速理论。笔者认为双方学者可以在进一步的对话中获益良多。

评论文章

6. 约翰·H. 泽米托:《历史/哲学/科学:历史哲学的教益——评汉斯-约尔格·莱茵伯格的〈论知识论的历史化〉》

莱茵伯格的论文主旨鲜明地强调了科学史对于我们哲学层面理解历史实践的重要性。莱茵伯格展示了20世纪科学界关于科学之本性的探讨:这些科学家和科学阐释家日益强调科学研究的局域性(local)和发展性(developmental),并以此构建了“依赖于历史经验上的知识观”,

即莱氏所谓“知识论的历史化”(historicizing epistemology)。通过将莱氏的科学观和他关于“实验系统”(experimental systems)的论述联系起来,本文将它们与其他科技史作(如拉图尔、皮克林、劳斯等学者的作品)作了广泛的比较,并考察了它们对于认识历史与科学哲学的关系乃至更一般的历史与理论的关系所具有的知识论含义。由此,笔者认为,一种关于实际科学(actual science)的局域的、调和的、“历史化的”(historicized)认识论,将有助于消解长期横亘于自然科学和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学之间的藩篱。

书 评

7. 康斯坦丁·法索特:《评凯瑟琳·戴维斯的〈历史分期与主权:封建主义与世俗化的观念如何支配时间政治〉》

戴维斯认为,传统上将欧洲历史分为“中世纪”和“近代”的断代法,将权力凯觐掩饰为一项历史事实。这种断代法把奴役和征服的史迹投射到“封建的”中世纪和非欧洲的当代历史,与此同时,它却掩盖了“世俗”现代性所践行的奴役和征服形式。因此,这种历史分期为篡夺自由和滥用权力提供了经久不衰的概念基础。

在以“封建制”为主题的全书第一部分,戴维斯追溯了“封建法”概念在近代早期英法两国发展过程中所遮蔽的法律、政治和殖民斗争,从而揭示此概念掩饰殖民压迫和论证欧洲主权的双重作用。在关于“世俗化”的第二部分,戴维斯分析了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瓦尔特·本雅明、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汉斯·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和莱因哈特·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等20世纪以批判“世俗化”闻名的学者,批判他们未能跳出“中世纪—现代”这一分期的窠臼。第二部分的结论部分考察了阿米塔夫·戈什(Amitav Ghosh)和英国史之父比德(Bede)的作品所提出的替代性概念框架。

该书中有三个局限值得一提。它追溯了隐藏在“封建主义”概念背后的政治史,却未探究“宗教”概念所遮蔽的政治史。它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打破学术与政治的联系,同时又不会导致逻辑困境或强化这种联系。它也未能正视这样一种可能:回答上述问题可能需要超越专业历史研究的狭隘领域。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许可以参照维特根斯坦对其《哲学研究》所作的总结,即将历史分期视为“人类自然史上的评论”(remarks o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human beings,语出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译注)。

8. 马丁·杰伊:《评理查德·J. 伯恩斯坦的〈实用主义转向〉和柯林·库普曼的〈作为过渡的实用主义:詹姆士、杜威和罗蒂眼中的历史性与希望〉》

实用主义传统的两大新书,即理查德·伯恩斯坦的《实用主义转向》和柯林·库普曼的《作为过渡的实用主义》,分别总结了过去半个世纪实用主义的历史以及它未来可能的研究议程。伯恩斯坦广泛考察了从皮尔士、杜威、詹姆士、布兰登(Brandon)、普特南到罗蒂等实用主义思想家,不但精当地指出他们的可取之处,而且也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他们的理论缺陷。库普曼也试图弥合他所谓的“经典实用主义”(classical pragmatism)和“新实用主义”(neopragmatism)之间的鸿沟,尽管他与其前辈相比更赞赏罗蒂。伯恩斯坦希冀从哈贝马斯那里挖掘丰富实用主义传统的资源,然而,库普曼则转而从福柯著作中获得启发。两位作者都强调实用主义的历史主义、进化论和转化论(transitionalism,即将思想、概念等视为某种转型过

程的组成部分加以研究的哲学方法,译注)层面的含义,结果却忽视了循环、破裂(rupture)、断裂(discontinuity)和非预期事件出现的历史可能性。就他们试图挖掘的政治涵义而言,库普曼所宣扬的社会向善论(meliorism)式的渐进改良论失于迂阔不实;而伯恩斯坦虽不满于罗蒂在其绝笔中对民主的尊奉,但却未能提出可资替换的有效理论。

9. 凯洛琳·斯迪德曼:《评塞巴斯蒂安·乔布斯与阿尔夫·吕德克主编的〈未安之史:历史编纂中的档案与叙事〉》

乔布斯和吕德克主编的会议论文集《未安之史》,超越了近年来史学界关于文化、语言学、主体性和档案等诸多“转向”,也超越了“后殖民主义”所提出的历史编纂问题。该书将历史编纂学的辩论引向思索历史学家作为作者的角色以及他/她与其研究对象间的关系。该书对于犹太大屠杀所展开的文化阐释,为学术的发展做出了某些重要贡献,并为历史重建奠定了伦理基础。本文将发轫于19世纪的“复活逝者”(raising the dead)视为西方社会史家的研究典范,从该书编者和作者的角度来说,它倡导我们更加重视历史学家的行为与写作。

2011年12月号

特刊:反思“历史距离”(historical distance)的隐喻

1. 雅普·顿·霍兰德、赫曼·保罗、瑞克·彼得斯:《导论:历史距离的比喻》

“历史距离”究竟何意?这篇导论从荷兰著名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拒绝开设当代史讲起,以论证“历史距离”是一个广泛存在于诸知识领域的隐喻。这一隐喻有着本体论、知识论、伦理学、美学,乃至方法论的丰富内涵——这意味着“历史距离”不能被简化为单一的“问题”或“概念”。同时,“距离”含义的多样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尚不存在一种容易辨识的、对历史距离进行学术反思的传统。通过对19世纪和20世纪历史理论的回顾,本文试图表明,“距离”虽然很少获得明确的阐述,但却是欧美历史哲学上历久弥新的一大主题。本文特别关注近年来对此隐喻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学者。最后,本文总结了本期特刊所录论文的主要观点。

2. 马克·萨博·菲利普斯:《反思历史距离:从教条论到启发法》

就其常见用法而言,历史距离指一种缘于时间流逝的冷静观察立场。在这种意义上,“距离”被长期视为现代史学实践的核心要素;但这种理解不但有失狭隘,而且强加了一种规范性目的。笔者建议从如下角度重新理解“距离”的含义:距离既是一种调解(mediate)我们与过去之间关系的更广泛的参与过程,又是一套囊括古今各种位距的连续光谱。在这种新的构想下,距离摆脱了它的规定性,成为我们审视历史表述史(history of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时一种颇有价值的启发法(heuristic)。以历史表述的调和范围观之,间离/间距的可塑性(plasticities)显然绝非局限于时间梯度。相反,我们在介入历史时所需的创造、感受、行动和理解之境域中的距离是与时间的流变性(temporality)密切相关的。这样,对每一部历史作品而言,我们都需要考虑至少四项与调解距离紧密相关的基本表述维度:(1)塑造历史表述之形式结构的题材、媒介和词汇;(2)历史表述中的情绪化陈述,包括其宣称或隐瞒的情感体验;(3)历史作品对政治、道德等行为的影响;(4)决定历史可辨别性的理解模式。这些互有重叠但绝不相同的距

离——形式的、感情的、意识形态的和观念的——为我们审视历史表述的变动模式提供了分析框架。

3. 马克·毕维尔：《不成问题的“历史距离”问题》

本文认为，对历史距离问题的关注是由现代的历史主义所导致的，它可以被后基础主义（postfoundationalism）所化解。19世纪的发展性历史主义（developmental historicism）在叙事原则上建立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连续性，并以此指导史料的筛选。在20世纪，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者转而拒斥这种叙事原则，因而制造了“历史距离”的幽灵：当代现实歪曲了对过去的重述，造成了事实和叙事之间的裂隙。因此，现代主义的问题随之产生：历史学家如何避免时代错置，以准确地表述过去？现代主义史学家不以叙事原则选取史料，而更倾向于将史实碎化为各种有效的叙事。然而，在20世纪晚期，后现代主义者（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和海登·怀特）认为，史实和叙事间的距离无法弥合。因此，后现代主义的问题是：历史学家在面对史实与叙事间无可弥合的裂隙时，应如何书写历史？今天，后基础主义消解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面临的历史距离问题。它认为，所有的观念（而不仅仅是历史性观念）都糅合着事实和理论，因而，后基础主义消解了观念的相对主义、文本意义和历史重述问题。

4. 汉斯·柯勒：《超越视距：时间分裂与历史距离》

观察者所处时点与某一历史时刻之间存在时间距离，但仅仅评价其意义并不能展现历史距离所蕴含的更加复杂的问题。普通的历史差异能激发诠释学视野，因而是“视距性”的。但它在仔细考察之下会失控破碎，导致所谓的“时感分裂”（chronoschisms，它是文学批评家乌苏拉·海斯在9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概念，用于描述后现代社会人们对时间的多元化感受在文体和叙事结构上的影响，译注）。笔者遇见一幅波提切利名画的经历为理解这种碎片化提供了实例。历史距离的复杂性也提醒我们注意不同性质的“距离”，包括无穷递归（endless regression，形而上学术语，译注）的深度，以及历史宏大性的高度。这些不同形式的历史距离挑战了常规史学实践的视距性特质。

5. 雅普·顿·霍兰德：《当代历史与自我疏离的艺术》

历史距离的隐喻时常出现在当代史学讨论之中。它意味着只有当我们和已逝过去保持一定的距离，方能准确地洞察历史。现代历史学奠基人兰克和洪堡认为，这种时间上的距离要求我们识别各种历史“观念”（ideas）或形式。这种理论或有其合理之处，但其前提之谬误却显而易见，因为我们无法直接观察过去——这迫使历史学家必须界定所谓“历史形式”的含义。就此，笔者讨论了三种已有理论。第一种是历史主义，即历史形式的客观化和局域化。第二种是叙事主义（narrativism），即历史形式在想象和表征领域的主观化和局域化。第三种则试图囊括并超越上述两种理论。它舍弃了单一的“形式”定义，而采取双重的“形式”含义。这意味着，无论是主客之分抑或古今之别，历史形式在两端都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主客观概念本身就令人困惑，笔者在文中采用了“一阶观察”和“二阶观察”的替代性划分法。这种区分有助于我们重述关于距离的隐喻，从而清晰地厘定当代史的理论地位。

6. 尤金·泽林纳克：《间接引用与历史距离的产生》

马克·萨尔博·菲利普斯在讨论大卫·休谟和历史距离时指出，距离的生成过程存在着“文

本之内”和“文本之外”之分。在本文中，笔者借鉴这种区分并引入一套语义学机制（“意义”），以赋予历史文本一定的内在距离。这种机制集中体现在一种所谓“间接引用”的观点上（以区别于那种无法容纳意义的“直接引用”）。根据间接引用的观点，意义开启了可称为“历史距离”的空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与历史距离的即时性（immediacy）和远距性（remoteness）有关的一切都可在这—文本层面上得到分析。事实上，笔者认为，我们只有考虑到书写和阅读历史的具体环境，才能理解距离的影响。间接引用的语义学可以创造历史的距离感，但这种距离的范围取决于创作和理解历史叙述所受到的环境制约。在本文的结论部分笔者指出，上述观点不应该被解读为否认历史作品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

7. 小林千夏、马修·马瑞恩：《伽达默尔和柯林伍德论时间距离与理解的关系》

本文首先指出，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是一种具有直觉性的时间模型，它体现了“时间距离”的观点，但柯林伍德的解释理论却拒斥这种时间模型。为了证明我们的看法，在简要评论柯林伍德对伽达默尔的影响以及二人就是否有可能揭示原作意图的分歧之后，本文考察了二人如何回答作为狄尔泰哲学之基石的“易位”（transposition）问题。本文指出，伽达默尔的解决方案采纳了时间距离的思想。该思想认为，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可由直面文本的传统所消除；柯林伍德则从目的论或理性主义的角度思考如何解释历史能动者的行为乃至理解文本的意义。而且，他认为这类解释并非是因果性的，其涉及的思想也并不随物理时间（它涉及时间距离的观点）的流逝而变化，这就解释了柯林伍德在揭示作品原意上所持的结论。正是柯氏的反相对主义立场促使伽达默尔声称，柯林伍德抛弃了“每一项理解行为所体现的诠释学的调和维度”。然后，本文讨论了伽达默尔和柯林伍德的著作所潜涵的时间观念，进而指出，利科（Ricoeur）在此问题上有着更精到的理解，因为他意识到柯林伍德的举动正呼应了海德格尔对“流俗时间”（vulgar time）的批评——尽管二人的批评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同时，本文也指出了柯林伍德对海德格尔“信息密封”（incapsulation）概念的反思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8. 赫尔曼·保罗：《距离与自我设距：二十世纪之交的理智德性与历史方法》

对于兰克学派的历史学家而言，“历史距离”有何意义？尽管历史距离常常等同于时间距离，但笔者对伯伦汉（Ernst Bernheim）《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的分析揭示出，对于20世纪之交的德国史学家来说，距离主要不是指涉那种让学者回溯性研究久远历史的时间流逝。如果伯伦汉的著作将历史距离视为历史诠释的前提，那么这一隐喻传递了一种自我设距（self-distanciation）的需要。自我设距并不是一种“消解”自我的浪漫愿望，而是一种德性的尝试，即将自我的观念和自身关于世界运行的直觉，纳入到研究那些对世界有着不同理解的人之中。尽管伯伦汉并未直白地讨论美德，但本文指出，伯氏在《史学方法论》中将自我设距视作有德之举，我们虽然有可能无法完全实现它，但应该全力追寻。对伯伦汉而言，距离需要知性美德和知识人格，也就是那代学人所关心的“学者人格”（*wissenschaftliche Persönlichkeit*）。伯伦汉关于“历史距离”的观念，其特征不是要将时间植入空间之中，而是要努力塑造“学术品格”（*scholarly characters*），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历史中的他者。

9. 瑞克·彼得斯：《宪政的诠释：距离的视角》

本文研究了美国宪政原意主义（即坚持对宪法的解释和施用必须符合立宪者的原本意图，译注）之争的哲学基础，以此探讨距离观念如何运用于诠释实践之中。本文集中展示了双方

主要代言人的历史主义预设，即原则上我们可以通过重构立宪者的原初意图来消解历史距离。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明确将其哲学诠释学建立在有关距离的观念上，这种观念有助于我们批判历史主义的理论预设。笔者的结论是，原意主义和诠释主义的立场并非水火不容，而应被视作就同一文本所提出的不同问题而加以融通。美国宪法的意义并非给定的，而是取决于诠释者提问的方向。意义的问题依赖性意味着，诠释遵循着声学原理：“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10.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距离的函数化》

本文始于笔者的直觉，即过去与现在（或者说，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过去”与历史学家对过去的“书写”）之间的关系应通过时间的距离来表述。人们认为，这种距离的空间性隐喻为我们理解历史知识的本质，提供了合适的知识论模型。这将引出两个推论：一是就理解历史书写而言，知识论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哲学工具；二是距离的隐喻——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是绝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知识论思想的模型。本文随后讨论了这两个推论的长短之处，并认为它们的确是我们分析过去与历史文本或表征关系的最佳起点。然而我们不能就此止步：的确，我们必须进一步诘问，我们与时间距离之喻的关系在何处可能产生误导作用？我们可以就此认识到，“距离”的观念最终不得不让位于“函数”的观念：从历史文本是“历史”的代入值（substitute）的意义上说，历史书写是一个函数，因此本文标题定为“距离的函数化”。

〔译者杨光烁，美国维思里安大学〕